



枫窗语文萃编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
荣休纪念文丛

杨剑桥 著





枫窗语文萃编

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荣休纪念文丛

杨剑桥 著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枫窗语文萃编/杨剑桥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5. 11
(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荣休纪念文丛)
ISBN 978-7-309-11466-9

I. 枫… II. 杨… III. 汉语-研究-文集 IV. H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02229 号

枫窗语文萃编

杨剑桥 著

责任编辑/宋文涛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2.875 字数 296 千
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1466-9/H · 2476

定价: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汉语轻重唇音的分化问题 / 1
陆德明音切中的重组 / 16
《切韵》重组 A、B 两类的归字问题 / 37
《切韵》的性质和古音研究 / 56
神珙《九弄图》再释 / 72

论端、知、照 _三 系声母的上古来源 / 75
论上古带 r 复辅音声母 / 85
闽方言来母 s 声字补论 / 100
段玉裁古音学的评价问题 / 122
上古汉语的声调 / 137
《说文解字》读若研究 / 155
汉藏比较语言学论略 / 178

近代汉语的唇音合口问题 / 194
关于“平分阴阳”起始时代的质疑 / 207

上古汉语语法札记 / 210
汉语动量词不产生于先秦说 / 222
吴语“指示词 + 量词”的省略式 / 232
从成语“箪食壶浆”的读音说起 / 234

2 枫窗语文萃编

论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原因 / 247

关于汉语多音节异形词的几个问题 / 256

“一声之转”与同源词研究 / 272

关于语言与文化、思维的关系的几点思考 / 290

评余迺永《新校互注宋本广韵》定稿本 / 302

《四库提要辨证》“小学类”商补 / 334

对某科研项目申报书的评审意见 / 349

《说文通训定声》“自叙”注 / 354

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卷首“说文”“通训”“定声”“转注”“段借”
篇注 / 371

杨剑桥语言学著述目录 / 397

后记 / 406

汉语轻重唇音的分化问题

一、问题的提出

自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提出“古无轻唇音”一说以来,汉语音韵学界绝大多数人是信奉其说的,但是由于钱氏只是证明轻、重两类唇音上古合为一类,而没有证明上古唇音声母究竟读如重唇还是读如轻唇,换言之,钱氏只是论证了音类,而没有论证音值,因此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,长期以来仍有不少学者怀疑此说,批评此说。比如符定一的《联绵字典》曾针锋相对地提出“古有轻唇音”,近两年王健庵、敖小平二位学者又相继强调“古无轻唇音之说不可信”,而提倡“古无重唇音”之说。有鉴于此,我们也想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,并在某些地方提出一些新的材料和观点。

二、钱大昕的功绩及其缺陷

在清代学者的上古音研究中,钱氏是独树一帜的,当许多人都致力于上古韵母的时候,唯独钱氏致力于上古声母,提出了著名的“古无轻唇音”“古无舌头舌上之分”和“古人多舌音”的观点,这些观点基本上为音韵学界所接受。在证明“古无轻唇音”时,钱氏提出了大量的证据,概括起来有以下七个方面:

(一) 古书异文,如《诗经》“凡民有丧,匍匐救之”,《礼记》引作“凡民有丧,扶服救之”。

(二) 汉魏反切,如晋《字林》:“邶,方代反。”

(三) 直音和读若,如《周礼》“设莞筵纷纯”,郑众云:“纷读为囿。”《说文》:“𦞦读若膜。”

(四) 声训,如《释名》:“负,背也,置项背也。”

(五) 异读,如《广韵》阳韵“武方切”十二字为轻唇音,其中“芒”等五字在唐韵“莫郎切”有重唇音又读。

(六) 重文,如《说文》云“朋”、“鹏”皆古文“凤”字。

(七) 方言,如“今吴人呼‘蚊’如‘门’”。

钱氏提出这七个方面的证据约有一百多条,数量是惊人的,但是这只能说明轻唇音、重唇音这两个音类在上古有相似性,而确定中古两个音类在上古是否合一,仅仅指明相似是不够的,还必须从音位系统考虑,看这两个音类是否互补,同时,如果确定为同一音类,还须指明后代分化为两个音类的条件。正如陆志韦先生在《古音说略》中所说:“古时实在没有轻唇,端知实在同声,然而不能单用经籍异文来证明,不管所举的例子有多少。”

当我们研究古代声韵系统时,音位学原理是不能不遵循的。宋跋本《切韵》中的俟母,虽然属下只有两个小韵六七个字,而且《广韵》“俟”可以跟崇母系联在一起,但是李荣先生的《切韵音系》根据“俟”小韵跟“士”小韵的对立,还是把俟母作为一个独立的声母。相反的例子是《韵英》,此书不仅不同等第的字有不同的反切上字,而且开合口也使用不同的反切上字,因此《切韵》一个见母在这里就有八套反切上字。但是赵元任先生从音位学观点出发,认为这八套反切上字无疑是为了切得和谐些才区别使用的,它们完全互补,因而仍然把它们归于同一个声母(赵元任 1941)。钱氏所提出的证据,证明了中古轻、重两类唇音在上古是极为相似的,它们可能是同一音位的两个变体,但这两个变体是否互补却并没有证明。此外,如果轻、重唇音上古同属一个音位,那么这个音位

的音值如何,钱氏也没有证明。当然,钱大昕的发明是伟大的,由于他的发明,后人才得以如此迅速地步入上古声母的研究领域;但由于时代的局限,钱大昕的论证还是有重大缺陷的。

三、轻、重唇音在上古的音类和音值

那么轻、重两类唇音在上古音位系统中是否相似,是否互补呢?其实,直到《切韵》系统,轻、重两类唇音音值仍然相似,出现环境仍然互补。《切韵》轻、重唇音大量互切,说明它们的音值是相似的;《切韵》轻唇音只出现在三等韵,重唇音只出现在前者范围以外的一、二、三、四等韵母中,谁也不能找到在同一韵母之中会同时出现帮和非、滂和敷、並和奉、明和微的情况,这说明它们的出现环境是互补的。既然如此,《切韵》的唇音声母就只能是一类;而既然《切韵》如此,那么上古的唇音声母当然也不分轻、重,因为两类声母上古分立,《切韵》合并,后代再分立,其间界限始终分明,这是不可能的。

有人说:根据陈澧提出的“凡切语上字同用、互用、递用的,必属同一声类”的原则,可以把《广韵》的唇音切语上字归成方、芳、符、武、博、普、薄、莫八类,前四类和后四类之间并没有同用、互用、递用的例子,既然如此,只能认为它们在《切韵》音系中分属八个不同的声类(敖小平 1984)。在古音研究中,我们的确需要大量采用陈澧的反切系联法,但这种方法是有局限性的。陈氏自己在《切韵考》中曾说:“切语上字既系联为同类矣,然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者,以其切语上字两两互用故也。”为此陈氏提出了“又音”的补救方法,他说:

如“多”、“得”、“都”、“当”四字,声本同类:“多”,得何切,“得”,多则切,“都”,当孤切,“当”,都郎切;“多”与“得”、

“都”与“当”，两两互用，遂不能四字系联矣。今考《广韵》一字两音者，互注切语，其同一音之两切语，上二字声必同类。如一东“涑”，德红切，又都贡切，一送“涑”，多贡切；都贡、多贡同一音，则“都”、“多”二字实同一类也。

但这仍然是不彻底的，因为同一声类如果没有又音，还是可能系联不上的。同时，所谓“又音”，既可能是同音异切，即读音相同，而反切用语不同，也可能是同字异读，即同一字具有两种以上的读音，怎么能一概视为同声类呢？这里唯一彻底的方法应该是音位学。李荣先生指出：“碰着这种情形（指同类而不能系联——引者），我们就看被切字出现的机会是互补的，还是有对立的。”（李荣1956）这种方法的例子已见上文。既然某些学者根本没有注意到音位学，他们的方法至今停留在一百四十多年前的陈澧时代，那么他们认为《切韵》有八类唇音声母的观点也就完全落空了。顺便说一下，陈澧系联《广韵》反切上字，并未能将明、微两母分开，因此《广韵》唇音字反切上字的系联结果并不是八类。

又有人提出，既然《切韵》不分轻、重唇音，那么为什么只见轻唇字切重唇字，而不见重唇字切轻唇字呢？这确实是亟待解释的。《切韵》有大量轻唇字切重唇字，如“卑”，府移切，“鄙”，方美切，“瞞”，武安切，但重唇切轻唇的却总共只有十几个字，如“湓”小韵，匹问切（《广韵》同，《集韵》芳问切），“怖”小韵，匹伐切（《广韵》拂伐切，《集韵》弗伐切），这是否说明《切韵》时代轻重唇音已经分化？或者说明上古只有轻唇音，重唇音是后代逐渐产生的呢？我们认为不能。

第一，《切韵》唇音字的反切上字确有分组的趋势，一、二、四等为一组，三等为一组，但这种分组不是轻、重唇音的分组。陈澧《切韵考》早就说过：三十六字母的“帮、滂、並、非、敷、奉六类，亦与《广韵》切语上字分合不同”。用图表说明，就是：

《广韵》唇音反切上字	出现环境	宋人三十六字母
博类、普类、蒲类、莫类	一、二、四等韵	帮、滂、並、明
方类、芳类、符类、武类	除下栏以外的三等韵,以及尤韵和东 _三 韵的明母字	
	东 _三 、鍾、微、虞、废、文、元、阳、尤、凡十个三等韵(不包括尤韵和东 _三 韵的明母字)	非、敷、奉、微

如果《切韵》唇音反切上字已经按轻、重唇音分化,那么“方、芳、符、武”就不应再做不发生轻唇化的韵的反切上字。事实上,在宋跋本《切韵》中,非轻唇化的支、脂、祭、真、仙、宵、侵、盐、庚_三、清、蒸、幽等十二个韵一百四十五个重唇音小韵,用轻唇字做反切上字的为六十八个,用重唇字做反切上字的为七十七个,这是不能用轻、重唇音已经分化的说法解释的(潘悟云 1983)。

第二,《切韵》轻唇字切重唇字的现象基本上集中在上述十二个韵之中,而这些韵中也存在同样多的重唇反切上字,这些韵除幽韵外全是三等韵,许多音韵学家都证明幽韵也是三等韵(董同龢 1945),因此实际上不应说“为什么只见轻唇字切重唇字”,而应该说,在《切韵》非轻唇化的三等韵中,重唇字和轻唇字都可以做反切上字,其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三等字。

第三,仅仅根据轻、重唇音字互为异文或互为反切上字,确实既可以说古无轻唇音,也可以说古无重唇音。钱大昕的论断确有武断之嫌。不过,如果考虑到汉语方言的分化和发展史,特别是吴方言、闽方言的历史,例如历史学和语言学都认为闽方言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的许多特点,它不是从《切韵》系统演变来的,那就只能得出古无轻唇音的结论。否则就必须解释:为什么吴方言保留重唇字比北方方言多得多?为什么吴方言论读是轻唇音,白读往

往是重唇音？为什么闽方言白读轻、重唇音不分？同时，如果说重唇音是后代产生的，还必须解释轻唇变重唇的条件，这也是难以办到的。有人说：“声母由弱化而简化是汉语语音的声类发展总趋势，闽方言也不例外，而且表现得更突出”，“闽方言轻重唇不分，是按汉语语音一般发展规律演进而弱化简化的结果，并不是什么存古”（王健庵 1983）。照此推理，闽方言是走在汉语语音发展的最前列了，其次是吴方言，最落后的是北京音，而现今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，则是与汉语语音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了。同时，人们还要问：除轻、重唇音不分外，闽方言又有端、知不分的特点，是否也是“按汉语语音一般发展规律演进而弱化简化的结果”？

第四，我们同意“古无轻唇音”，反对“古无重唇音”，还有一个证据，那就是梵汉对音，这个证据同时也解决了《切韵》乃至上古唇音声母的音值问题。在汉魏陈隋时代的佛经译音中，不但重唇字用来对译梵文的双唇音，如：

paramita 波罗密多（“波”，帮母字）
 pahlava 朴桃（“朴”，滂母字）
 abhipada 阿鼻婆陀（“鼻、婆”，並母字）
 dharma 达摩（“摩”，明母字）

而且，轻唇字也用来对译梵文的双唇音，如：

purna 富啰拏（“富”，非母字）
 pundarika 芬陀利迦（“芬”，敷母字）
 yambu 阎浮（“浮”，奉母字）
 namah 南无（“无”，微母字）

有人说，梵文没有轻唇音，所以不能证明汉语轻、重唇音的问题。梵文的 *v* 究竟读作双唇塞音还是摩擦音，学者们还有争论，我们姑

且不谈,但是如果当时汉语轻、重唇音已经分化,那么译音者为什么舍“补、布、部、步、模、奔”等重唇字不用,而用“富、浮、无、芬”等轻唇字来对译 pu、bu、ma、pun 呢? 又有人说,“南”在“南无”中读“那”,但不能说“南”古音“那”,同理,也不能说“无”古音读 m。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推理。“南无”namah 又译作“那谟”,na 受 m 的同化,就译成“南”,这是译音者不同的听音结果,跟“无”读 m 有何相干呢?

总而言之,我们认为从上古直到《切韵》时代,轻唇音作为一个音类始终没有产生出来,同时我们也确认,从上古直到《切韵》时代,唇音字的音值应当是 p、p'、b、m,也就是后代所说的帮、滂、並、明。

四、轻、重唇音的分化时代和条件

上古既然只有重唇音没有轻唇音,人们自然会关心汉语轻、重唇音是何时分化的? 分化的条件是什么? 分化的过程又如何?

自从唐末沙门守温的韵学残卷在敦煌被发现以后,人们根据其中所录三十字母只有一组唇音声母的事实,推定汉语轻、重唇音的分化在唐末尚未发生,有人甚至认为轻、重唇音的分化发生在 12 世纪。但是早在 11 世纪中叶邵雍《皇极经世》中,轻唇字“夫、父、武、文”已经列在开列(一等),“法、凡、晚、万”已经列在发列(二等),说明当时轻唇字声母后的 i 介音已经消失,成为洪音字,跟轻唇字的现代形式相似了,因此可以确认当时轻、重唇音的分化已经完成。几乎跟邵雍同时,《集韵》(1039)则把《广韵》大部分轻、重唇相混的反切加以改正,其《韵例》云:“旧以武代某,以亡代茫,谓之类隔,今皆用本字。”此前三十二年,《广韵》的修订者虽然不愿过多改变《切韵》原貌,但鉴于实际语音的变化,还是在每卷

之末加注了“新添类隔今更音和切”，这其中就改正了许多轻、重唇混切的例子。这一切都表明在当时实际语音中，轻、重唇音已经是两类音值不同、音位对立的声母了。事实上，更早的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(810)的反切中，轻、重唇音也已经截然不混(黄粹伯 1931)。此书景审序云：“古来音反，多以旁纽而为双声，始自服虔，元无定旨。吴音与秦音莫辨，清韵与浊韵难明；至于武与𪚦为双声，企以智为叠韵，若斯之类，概所不取。近有元廷坚《韵英》及张戡《考声切韵》，今之所音，取则于此。”上文已经提及《韵英》反切的特点，慧琳为了区分轻唇音“武”和重唇音“𪚦”等，取则于《韵英》自然是十分妥当的。由此可知，汉语轻、重唇音分化的完成，当早在 8 世纪末 9 世纪初。而守温韵学残卷只有一组唇音声母，我们一直认为这可能带有存古的性质，或者是当时南梁方音的反映(张世禄 1936)。

至于轻、重唇音分化的开始时间，我们认为可能始于 7 世纪中叶。因为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唇音字反切的系联表明当时轻、重唇音已有分化的趋势(周法高 1948)。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，玄奘对某些旧译的改动也表明这种分化已经开始(施向东 1983)。例如：

ajitavati 阿恃多伐底河(旧曰阿利罗跋提河，讹也。)

jivaka 时缚迦(旧曰耆婆，讹也。)

vaksu 缚刍河(旧曰博叉河，讹也。)

vasubandhu 伐苏畔度(旧曰婆藪盘豆，讹也。)

在玄奘音中，“伐/跋”主元音均为 a，但译者宁可用具有 i 介音的三等字“伐”，而不用无 i 介音的一等字“跋”来对译 va，可见其用意在于指明 v 是摩擦音。而我们今天看来，这则正好表明“伐”字已由双唇塞音向唇齿擦音发展了。其他“缚/婆”“缚/博”“伐/婆”关系同此。

轻、重唇音分化的条件是什么？高本汉以来的音韵学家大多

主张条件是三等合口。但此说成立有三个困难。第一,《切韵》同一个唇音字既可做开口字的反切下字,又可做合口字的反切下字,如“杀”,所八切,“滑”,户八切,唇音字“八”同时做开口字“杀”、合口字“滑”的反切下字。因此赵元任(1941)从音位学的角度提出唇音字不分开合口的观点,这样一来,所谓“三等合口”的条件就成跛脚。第二,即使承认唇音字有开合,也还有困难。因为在宋人韵图中有好几个韵是独韵,既非开口,亦非合口,此中就包括东_三韵、尤韵、虞韵等,既然是独韵,不存在 u 介音,又怎能说“合口三等”呢?有人说,重唇变轻唇的条件是合口三等,而后代变轻唇的字就是合口三等字。但这样互为因果,又会被讥为循环论证。第三,重唇合口三等变为轻唇的发音原理是什么?王力先生说:“这是因为韵头 iu(=y)是圆唇元音,它往往使牙床骨向前伸,以致上齿接触下唇,所以前面的双唇音变为唇齿音(轻唇)。”(王力 1983)可是,人的牙床骨向前伸,只能造成下齿接触上唇的结果,这可是怎样一种唇齿音啊!汉语的轻唇音绝非如此。若要上齿接触下唇,牙床骨只能往后退,而不是向前伸,可见“合口三等”并不能解释轻唇音产生的发音原理。

鉴于以上种种,音韵学家们开始另寻轻唇音产生的条件。赵元任设想:“如果一个唇音字有一个高 i,后接一个央元音或后元音,它总是伴随着牙床位置的后移,于是就有下唇接触上齿的趋向,这就产生了唇齿音。”(赵元任 1941)这一设想极具巧思,它符合重唇变轻唇的东_三、鍾、微、虞、废、文、元、阳、尤、凡十个韵的情况,但有三个障碍,即在以往的构拟中,侵、蒸、庚三韵的中古音也是 i 加央后元音,却没有演变为轻唇。

其实这三个障碍都可以克服。赵元任说:“在侵韵 iəm 和蒸韵 iəŋ 中,元音 ə 与上古音的研究结果很相符,但是就它们的中古音韵地位或跟现代方言的关系来说,把它们拟作 iem 和 ieq 亦无大

碍。”(赵元任 1941)实际上,在隋代诗文押韵中,臻摄痕、魂两韵跟殷、文两韵通押较多,而臻、真、淳三韵跟以上四韵通押极少(李荣 1961—1962),因此,如果痕、魂、殷、文四韵的主元音为 ə ,那么真韵就不当为 ə ,音韵学界大多把真韵主元音拟作 e 。侵韵跟真韵是类似的韵部,只是韵尾不同,隋代诗文中侵韵独用,而南北朝时侵、真通押却不少,看来侵、真两韵主元音相近(王力 1936)。既如此,侵韵主元音实为 e 。从南北朝一直到隋代的诗文押韵,蒸韵与登韵虽然同摄,但没有通押的例,故蒸、登主元音不应相同。在周隋时代的梵汉译音中真、侵、蒸大都对译梵文 i ,如真韵字“民”对译 min ,侵韵字“金”对译 kim ,蒸韵字“兴”对译 hing ,而登韵字“登”对译 tang (尉迟治平 1982)。因此,蒸与侵、真主元音相近,同样为 e 。此外,高本汉把庚韵主元音拟作 e ,这样庚韵当与唐韵 aŋ 接近,但是从南北朝直到隋代的诗文押韵,庚都跟耕、清、青通押,跟清韵关系尤为密切,因此庚应该是前元音,我们拟作 a 。

越过上述三个障碍之后,我们现在可以确认:汉语重唇音演变为轻唇音的条件就是 i 介音后接央后元音。

那么,为什么当重唇音 p 、 p' 、 b 、 m 后接 i 介音和央后元音时,就会变成轻唇音 f 、 v 、 m 呢? 我们知道,当发音器官在发出前一音素时,已经作好发后一音素的准备,于是前一音素的发音往往会受到后一音素的影响而发生音变。当我们发元音 i 时,舌位又高又前,紧接着是央后元音,舌位要迅速变得低而后,于是带动牙床骨迅速后退,结果使上齿接触到下唇。

当然,这里所说的音理仅仅造成音变的可能。一个音变是否成功,最终取决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,吴方言、闽方言至今犹存大量重唇音,就是这一缘故。

五、轻、重唇音分化的过程

语言学理论告诉我们,一个音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,为了保证人们交际活动的正常进行,它只能采取渐变的方式,而不是突变的方式,因此重唇音并非一下子变成轻唇音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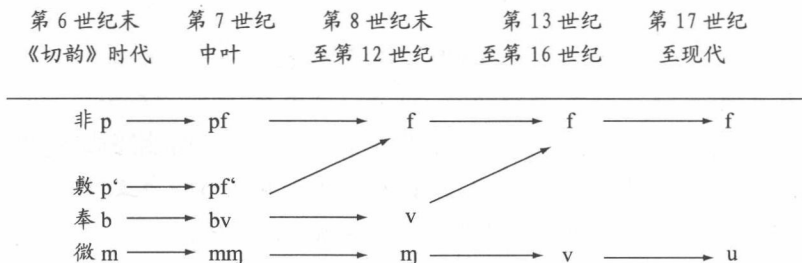
上文已经指出,《切韵》时代不分轻、重唇音,到7世纪中叶,轻、重唇音开始分化。这里所谓的《切韵》时代,依陆法言“昔开皇初”云云,当是公元6世纪末。《切韵》音系的框架是当时决定的。到8世纪末9世纪初,轻、重唇音的分化已经完成,而且非、敷两类也开始混同(黄粹伯 1931)。不过在邵雍《皇极经世》时,奉母 *v* 尚未并入非、敷 *f*,因为在“四音”中,水行是非母字,火行是奉母字,水行与火行清浊对立,可见奉母仍然是 *v*:

	清	水	夫法□飞
四音	浊	火	父凡□吠

而从1269年元世祖颁布的八思巴字中,可以看出汉语的非、敷、奉已经合为一类(龙果夫 1930),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韵》(1324)也证实了这一点。

至于微母,演变为轻唇音的时间是比较迟的,在颜师古的《汉书》注中,帮、滂、並和非、敷、奉已分化,但明和微相混。到8世纪末9世纪初,微母开始演变为 *mj*,例如“无”,由 **ma* 变为 *mjo*,因此晚唐时期一些诗人开始用“么”、“磨”来代替疑问语气词“无”。到《中原音韵》和《韵略易通》“早梅诗”(1442)时,微母变为 *v*。据陆志韦先生,这个 *v* 要到17世纪才变为元音(陆志韦 1947)。

这样,我们可以把重唇音演变为轻唇音的过程排列如下:



有人认为:从重唇音变为轻唇音的过程中, pf、pf'、mj 的阶段是主观猜想,“因为域外译音和国内的方音中都找不到这样的例证”(史存直 1981)。我们幸而知道西安和兰州都是有 pf、pf' 这样的发音,而上海话的“勿”实际是 mjəʔ, 所以世上有这样的音是无疑的。其次,在张参《五经文字》(776)中,轻、重唇音已经分化,而且非、敷基本不混(邵荣芬 1964)。《五经文字》以当时长安方音为取音准则,既然非、敷不混,就说明当时长安话非、敷有别,如果把非、敷构拟为 f、f', 在实际语音中显然难以区分,因此,我们认为非、敷在开始时仍以 pf、pf' 为妥。

六、两点辨正

主张不是由重唇变轻唇,而是由轻唇变重唇的学者还有两个证据,我们在此一并加以分析。

王健庵先生曾经举《经典释文》的例子证明轻唇音发展为重唇音,他说:“陆氏在《书·禹贡》‘蟪’字下已注‘蒲边反’,又云‘徐,扶坚反’;《诗·召南》‘摽’字下已注‘婢小反’,又云‘徐,扶小反’。如果当时轻重唇不分,这些切语就变成重组性的同音异切。这是轻重唇音异音异切的明证。唇音重组的出现,事实上就是由所谓类隔、由原来轻唇音改为音和的重唇音而引起的。”(王